

暴君的威勢
在消逝中

威廉·加拉赫著

世界知識社

暴君的威勢在消逝中

威廉·加拉赫著

耿濟安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718108

暴君威勢在消逝中

威廉·加拉赫著
耿濟安譯

William Gallacher
THE TYRANTS' MIGHT IS PASSING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54

根據英國勞倫斯一章沙特書店一九五四年版譯出

暴君的威勢在消逝中

〔英〕威廉·加拉赫著
耿濟安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64·850×1163耗1/32·3³/₈印張·81,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400 定價：(6)0.33元

目 錄

第一章	失去了戰鬥力.....	1
第二章	陰謀破壞.....	7
第三章	吸取教訓.....	17
第四章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信仰.....	24
第五章	死胡同.....	31
第六章	澳大利亞之行（日記摘錄）.....	39
第七章	財神.....	45
第八章	英國廣播公司与宗教.....	51
第九章	幻想——舊的和新的.....	67
第十章	新世界在前進.....	78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与和平.....	82
第十二章	生活的道路.....	89

第一章

失去了戰鬥力

我在1950年1月大選落選以後，就听任英國共產黨蘇格蘭區委員會的調遣。我曾在宣佈選舉結果的時候，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在結束的時候，我說：

“我進議會以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在議會裏面，我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現在，我仍舊是一個工人階級的鼓動者。”

蘇格蘭的同志們就讓我參加這項工作，並照這樣安排了一個工作程序。

要做的事情很多。召開各種宣傳會和號召撰寫有關各種問題的論文和小冊子。這次學劃周到的運動的最引人特點是：在一系列的工廠門前集會，克萊德的各個主要工廠都在計劃之列。

當我在這些工廠門前的集會上講話的時候，我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我又回到將近半世紀以前我所開始的工作上了。好像又回到了我的青春，我懷着一種幾乎是情不自禁的渴望，想看到克萊德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沸騰起來。當然，我知道，情況是與從前完全不同了，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和從前不同的和更艱難的任務。

1914年，我們必須把克萊德鼓動起來反對戰爭和那個應對戰爭負責的資產階級。工資、房租、物價是當時激起工人憤怒的一切促成因素。

但是在1950年，由於工資、房租和物價仍舊是推動的因素，由於蘇聯、人民中國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存在，由於世界上三分

之一的人口都在民主陣營方面，工人階級正進入一個真正奪取政權的時代。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環境所引起的形勢上的變化。危機一個跟着一個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法解決危機這一事實，是一天比一天地明顯了。舊制度必須廢除，由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代替。

這是目前一切問題中最基本的問題。是工人階級遲早要面對的問題。現在他們還相信，工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總會設法領導他們向着這個目標前進。然而，慕爾康工黨年會的結果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非常明顯，工黨的普通黨員對於工黨右翼的領導和政策已經開始發生懷疑。不過他們要吃了許多苦頭之後才能完全打破幻想。他們要等到走過許多歧途之後，才能走上推翻資產階級和實現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我心裏雖然這樣想，而我在那些中午集會上演說的時候，還是感覺着非常興奮。我興奮到這種程度，以至我在本城（培斯利）和兩位老朋友談話的時候，他們當中的一位曾說我顯得很健康。我講起話來好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並且對自己的健康和精力還大大地吹噓了一番。我同他們分手以後，就回家了。兩個鐘頭之後，我就陷於痛苦之中了。在往下講以前，讓我先介紹一下同我談話的那兩位老友，也許是很有意思的。

一位是詹姆士·斯特林，年輕的時候就是唯俗會的會員。他是一個堅決的無神論者，像獅子一樣地勇敢，兇狗一樣地頑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艱苦的時期，他算是我的“保鏢的”。當我在抨擊資本主義和戰爭的時候，凡是不識相而來干涉我的人，都倒了霉。

另外一位是約翰·帕特遜，他是一位很沉靜、很聰明而和睦的人，見聞很廣，並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真是奇怪的三個人！但却是極好的朋友。

我躺在睡椅上。我站起來，俯身靠在火上取暖，在屋子裏

走來走去。我的痛苦不見減輕。最後珍扶我睡倒在床上，把一隻熱水袋橫放在我的肚子上。这也無效。一會兒輕，一會兒重，越疼越厲害。五點鐘的時候，珍去附近的公共電話室打電話給醫生。大約六點鐘的時候，醫生來了。他診斷不出是什麼病。他對珍說，“如果你有熱水，你可以試試讓他洗一個澡。”他就這樣走了。我們當時有熱水，於是珍在洗澡盆裏放上水，我就坐進去。說也奇怪，我已經痛了三個鐘頭，待我一坐到熱水裏，馬上就完全不痛了。再沒有任何難受之處。我向後靠着，對珍說，“假如你給我兩條毯子，我就在這兒睡了。”這是我當時實際的感覺。待了一會兒，我得出澡盆。疼痛又恢復了，但不如以前那樣厲害。之後，珍出去參加培斯利煤炭合作社的會議去了，她是一個社員。我很安心地躺在床上，一直到十點鐘左右她回來的時候。

我又洗了一個澡，經過仍是一樣。疼痛完全消除了。當我走出來的時候，痛楚是那樣輕微，幾乎感覺不出來。我酣睡了一夜，星期六早晨覺得好多了。一點痛苦都沒有了。

然而，為了小心，星期六整天還是待在家裏。如果星期日那天也待在家裏，也許我就戰勝了病的侵襲。但是我已預定星期日的下午在格拉斯哥的一個露天會議上演說，晚上在馬塞威爾的室內會議上演說。星期日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正颳着尖銳的東風，時而還下着牛毛雨。如果我稍有一點常識的話，就應該轉回去，躺在床上。我從培斯利勉強地走到格拉斯哥的西攝政街，一路上覺得越來越不舒服。同志們都看出來我有點兒不對。我作了一個簡短的演說，就要找一個地方去躺下。他們說，“你不如回家去吧。”

我回到家裏，躺在床上，真的成了一個病人。大約在早晨五點鐘左右，我發起抖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呵；床震動得似乎要垮下來。我不斷地對自己說，“我這是幹什麼呢，我得停着不動，”可是我还是連連發抖。把隔壁的鄰居請進來了。我聽見他說，

“他的情形很坏，頂好請医生來吧。”八點鐘的時候，医生來了。他一看我，就用電話叫了一部救護車，於是我就進了皇家亞歷山大醫院。我被抬進病室。所有的床位都滿了，只有病房的鄰室还有一个空位，就把我扔在那裏。我常常以訪問病人的身分進入醫院，而作为一个病人，就和大多數人一樣，對於醫院有點兒戒心了。但是現在我躺着不想，也不在乎——与世無爭。

兩位外科医生，米勒大夫和柯赫蘭大夫，像对其他病人一樣，對我照料得很仔細。他們起初診斷是急性胆囊炎的病症，後來經過愛克斯光透視就証實了，他們很怕影响到肺，引起肺炎。三天內什麼東西我都不曾吃，只是時而喝一點汽水，以後就吃醫院規定的飯食，說實話，我真欣賞這種飯食。

有一位護士向我作自我介紹，說她是“麥克瑞護士”。一種感觸忽然貫注到我的全身。“你是帕特弟兄的女兒麼？”我問她：“是的，”她回答。這引起了我不無限的回憶。

帕特·麥克瑞——一位真正英俊的少年——我在“克萊德起义”一書裏面已經說過，是我第一個講壇上的同事。他是一個有急智有口才的人，一個老練的作家、聰明的漫画家，如果他不早亡，他在工人運動裏面就會很出名。當他參加本地報紙“培斯利每日快報”某種辯論的時候，報紙揭示欄上的目次裏面，就標出“帕·麥的來信”。報紙定會掃數賣光。記得有一次他給一個專門講“祈禱功效”的宗教通訊員糾纏不清的時候，他寫道，這個傢伙使我想起一個女人對她的鄰居說，“靠上帝和兩個大警察的協助，我把我的那個喧鬧的房客趕掉了。”

帕特和我在每個星期日晚上主持社會主義集會。我們輪流着講話。在那些早年時代裏，我愛把我的衣服弄得別緻些。現在誰看見我也會想到我是那樣的。有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在培斯利廣場的一大羣人面前，帕特登上講壇，講得很神氣。我站在講壇旁邊等着輪流。那天晚上我穿着一件奶油色的漂亮背心，背心边上和四個口袋的緣上鑲了翠綠色的邊。一枝銀鑲頭

的細手杖和背心互相輝映。帕特愈講愈起勁。他警告工人应当對什麼樣的人警惕。那些想要愚弄和欺騙他們的人。“要注意那個大腹便便的傢伙”，他勸告他的聽眾說，“要注意那個面貌顛頂的傢伙”。接着他真地講得興奮起來，大聲地喊着說，“要注意那個穿漂亮背心的傢伙”。四面的哄笑使他楞了一剎那，只一剎那。他向下面對我望了一下，看是怎麼回事，隨後臉上現出恍然大悟的神氣，也咧着嘴笑了。他用大拇指向我指了一下，對羣眾說，“他會給自己說明的。”

我所住的那間房，是給病室裏能走路的病人作娛樂室用的。這間房有一面是臨大街的窗子，病人都喜歡由窗子裏向大街眺望。因此我總有伙伴給我講各種病症和施手術的故事。其中有一個青年因發生意外受了重傷，正在休養。他的右臂被傳動帶扭着了，幾乎撕成碎片。肘彎以下施手術截去了。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知道他是天主教徒，是因為本地報紙登載了一大篇關於我病倒的消息，結果有很多訪問病人的人都向這間房窺看。

一天下午，正當失掉右臂的青年在娛樂室的時候，一個天主教神父來了。青年人起身離開娛樂室，回到他的病床上去，這是訪問人來的時候，病人應當遵守的規則。但是神父又把他引到這間房裏來（我不願意說是把他推回來的）。他也要瞧瞧我這個“展覽品”。

後來，有一天這位天主教徒同我聊起天來了，我們談到帕特·麥肯納喪失了第二條腿的事，和大病房裏其他淒慘痛苦的病人。待我們談了許多這類的事情以後，他慢慢地搖搖頭，給我來了下面一句話：

“幸虧上天還照顧我們。”

我向青年看了一眼。他的態度既莊重又嚴肅，我心想，“你的臂膀被扭住的時候，卻沒有好好地照顧你呵。”

另外有一個病人，因為得了胃潰瘍，施行了一次手術。他已

經受了好幾年的苦，但是現在，他說，他已經“延長了壽命”。他說，1919年2月同警察發生衝突的那個星期五，他也在格拉斯哥的喬治廣場上，我從這些話和其他的言語上面知道他在工人運動裏面也是一個老前輩。他又提醒我，當我和珍住在倫敦的時候，他和他的妻曾在我們威爾街的房子裏住過三個月。他們自己找不到住處，珍就把鑰匙交給他們了。但是我還是想不起他是誰，因為有許多人曾經臨時借用了我們威爾街的房子。我把那個青年人的事告訴了他。我說，“他是一個天主教徒，他同我談到大病房的人所受的痛苦時候說，‘幸虧上天還照顧我們’。我心裏想，‘你的臂膀被扭住的時候，卻沒有好好地照顧你呵’。”我以為他聽見這句話會笑的，可是他沒有笑，卻板住臉，慢慢地離開我的病床，走出了娛樂室。當珍來的時候，我說，“這裏有一個害胃病的人，施了一次手術，他說他同他的妻曾在我們的家裏住過三個月；他是誰呀？”“那就是霍利德，”她回答說。“天哪，”我哼着說，“他也是一個天主教徒。難怪他不笑。”接着我就把那個失去右臂的青年人的故事告訴了珍。

但是，唉呀，可憐的霍利德。他沒有延長壽命。他連手術都沒有再施行。三個月以後就死去了。當然那時我已經出了醫院（我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並且恢復了健康，不過體重還不夠，須要休養一下。

第二章

陰謀破壞

在大选以前和大选時期，反对共產党的運動下流到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反共的人在污泥坑裏打滾，向各方面激濺泥水。當時我對我的同志們說，“唉，他們墮落到這種地步，他們簡直無法再墮落下去了。”但是我低估了他們的陰險欺詐的技能。

當我在蘇聯度了一個極有意義和增進健康的休假而回來的時候，我發現英國不僅正被拖進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與此同時，政治領袖方面、報紙和廣播方面都正努力進行要比美國佬還為出色的誣衊運動。

結果，無論發生了什麼錯誤，無論什麼地方出了什麼事故，都歸之於共產黨的“陰謀破壞”。有一天，利文谷的一所大建築物失了火，建築物裏面存放着科茲棉織品康秉納的大量物資。這是一次焚燒劇烈的大火。第二天，報紙上就登出“疑有陰謀破壞”的標題。實際上一些比較投機的報紙甚至進而用一些陳腐濫調，大肆渲染一番。過了幾天，我在格拉斯哥聖安德魯大廳的一個示威性集會上講話的時候，提到了這些報道。我表示的意見是：某些保守黨頭子可能是嫌疑犯，因為他們都是嗜好印第安人所謂的“火水”（按即烈酒。——譯者）的，不過我覺得十拿九穩他們要用歸罪於共產黨人的手法，使他們自己能擺脫嫌疑。我說，其實這種誣衊運動已經達到了這種地步，沒有什麼事故不歸咎於我們。我告訴他們，那天下午我走進一個書店，一個陰沉着臉的傢伙，向我走來，咆哮着說，“喂，威廉，哪裏來的這些雨呀？”“不行，不行，”我抗議說，“你不能叫我們對這件事負責”。

當然在利文谷堆棧那裏並沒有“陰謀破壞”。但是報紙對這

些原始捏造的故事却從來不加以更正，結果把毒素注入到成百萬讀者的心裏，消毒也不可能。這個國家的法律制度真是駭人，更不用說道德的標準。最下流的謊言可以發表而且真被發表了，並且對這種事情一點辦法也沒有。可是如果我指出這些說謊的人，說出我的直率的意見，那末發表我的聲明的人就會被誹謗的行為所陷害。

這種“陰謀破壞”的誹謗在1950年7月30日艾德禮的廣播演說裏得到了可稱之為官方的立場的最大支持。在這不久之前，靠近朴茨茅斯的高斯港有一些彈藥駁船爆炸了。幸而沒有死傷，但是幾乎釀成巨災。出事地點的人所發出的第一個官方報告裏面，有這樣的話，“並無陰謀破壞的問題”。顯然這個報告不能使有些方面滿意，因為幾天以後，從同一個來源又發出了一個報告，裏面的話變成了“不能忽視陰謀破壞的問題”。你也許會聽見反共分子嘖咕着說，“這比較好點，這就給我們一個向四面八方散佈的機會。”散佈他們確是散佈了，那沒有問題。首先出馬的，我已經說過，就是艾德禮。

以下是他對於“正義”和“真理”的貢獻：

“第三，我要求你們全都要防備內部的敵人……最近發生了陰謀破壞的事件，例如朴茨茅斯的暴行。”這句話是毋庸解釋的。他說“陰謀破壞”，他的意思就指“陰謀破壞”。所以讓我們暫且研究一下這個問題，看是否可能了解它在政治鬥爭策略中的性質。

每逢提到陰謀破壞的時候，提出的方法總是給人一種印象，這是共產黨活動的公認的方式。再沒有比這更不正確的了。相反的，陰謀破壞猶如政治暗殺一樣，是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所教導的完全相抵觸。這些偉大導師的最根本的思想表現在許許多多的著作裏面：如論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在這種社會裏不斷地進行着階級鬥爭，如論由資本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所極關重要的革命“藝術”。然而在這這些偉大的天才所有的權威

著作当中，却找不到半句允許一个共產黨員或一个共產党耽溺於陰謀破坏或政治暗殺的言論。这种策略会把建立無產階級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性毀滅。陰謀破坏和政治暗殺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進攻的方式，是代表“个人事業”的——这个“英雄的”个人，为了除掉暴虐的或者可惡的統治者，如遇必要，就犧牲他自己的生命或者甚至拿别人的生命作代價，來表現一下他个人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和他的階級所从事宣傳的政治要求上。

但是共產党人不相信，从資本主义轉变到社会主义可由“英雄的”个人用陰謀破坏和政治暗殺的方式作出一些駭人的行为而取得成功。这是当資產階級致力於由君主專制和貴族統治中把自己解放出來的時候，沙皇俄國和其他國家的秘密小組所喜欢用的东西。但是和“英雄”一起，还培养出一些“告密者”和“特务”，到後來，这些人彼此簡直很难區分了。

相反的，共產党人把他們的信心寄託在工人階級身上。从這裏，也只有从這裏，才可以得到力量來战勝和推翻我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我們所說的一切和所作的一切，都必須導向爭取工人為夺取政权而進行革命鬥爭的这个偉大的任务上。秘密小組，个人表現或駭人的行動会使我們的工作成为不可能。这种轉变不能由个人來實現，不管他是怎样能幹。它只能由一个階級——工人階級——來完成。个人的行動會產生猜疑和不信任，並且會分裂而不能團結各种力量。就連我們的敌人的譴責、謊言和誣蔑也能產生这种效力。这就是他們要製造謊言和誣蔑的原因。資本家和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者最怕一个團結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階級。

他們也真應該害怕。因为当工人站立起來，團結起來並变得强大時，資本家就要倒下去，永远起不來。陰謀破坏、陰謀破坏的嫌疑或散佈陰謀破坏的惡意謠言，使我們所進行的这种偉大任务更加困难。当我们敌人的制度腐朽而衰弱下去的時候，

他們使用惡意的誹謗也就更其頻繁了。不僅如此，一遇到机会，他們還會叫他們自己的代理人去幹如像在德國所幹下的那種罪惡的工作，當戈林用火焚燒國會以後，就開始咆哮得像一隻瘋牛，說這種卑怯的縱火行為是共產黨人幹的。

但是戈林的咆哮現在已經給人壓倒了！各位女士和先生們，我給你們介紹一下一隻真正的海獅，雅茨先生吧。你問，雅茨先生是誰？我回答，雅茨先生是全國海員工會的總書記。不過我必須承認，雖然我已經作了將近半世紀的工人階級的鼓動者，直到我看到一本1950年7、8兩月合刊的“海員”雜誌以前，我却從來沒有聽見過這位先生的大名。我們的海獅——因為一隻海狗還吼不到他一半高的聲音——給當時的首相艾德禮先生的廣播演說迷惑住了，就吼叫着說：

“首相告訴議會說，政府手裏現在有可以使他們滿意的證據，證明7月14日在朴茨茅斯港所發生的軍火駁船的爆炸，是由一些不知名的人所幹的勾當。現已有充分的證據可資證明，這些爆炸是以很豐富的科學知識為根據的。這就構成了一種陰謀破壞的行為，說明在我們中間有外國的勢力存在。

“在朴茨茅斯所發生的只是許多事件之一。還有其他的海軍船隻神秘地遭受損傷、起火、爆炸和被破壞的事件，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這些犯罪的人對於他們的行為的後果絲毫都不考慮；他們對於由此而引起的生命損失和災害蔓延是完全無動於衷的。正如首相所說，朴茨茅斯的爆炸沒有在火藥庫工人和住在附近的他們的家屬當中招致嚴重的生命損失，只是一種奇蹟……

“但是，對於縱容他們犯罪的那些人怎麼辦呢？對於那些隱藏在組織裏面，計劃用陰謀活動來推行他們的政策的人怎麼辦呢？對於那些從這樣一種組織的領袖處接受指示，像老鼠一樣鑽進工會的行政裏面的人，對於那些有計劃地

醞釀把工會領導權交給共產黨人，並且用工會的錢來宣傳他們的暴行、恐怖主義和不法擾亂的同謀者——也許他們自己還不知道——怎麼辦呢？對待他們只有採取一條道路。必須把他們搜出，窮追，並且從我們的運動裏面驅逐出去。”

從我國還沒有發生一件政治性的陰謀破壞這個事實看來，我想大家會承認這是說得太過火的。然而這種誹謗和煽惑却正供給海員們閱讀。海員們經常遠在長途的航行中，和他們的同人不通聲氣，沒有機會來核對登在他們自己報紙上的東西。任何一個“鼓動家”——凡是反對雅茨及其黨徒的——都得“搜出，窮追，並且從我們的運動裏面驅逐出去”。當然，雅茨先生這樣說，如果他們還沒有“按照法律”被處死的話，那就要這樣做。

文森特·陶遜爵士在9月的職工大會上向代表們讚揚了這個顯而易見的惡毒謠言。我覺得必須採取行動。但是採取什麼行動呢？想登報否認是作不到的。我收到了許多封從編輯部寄來的信，包括從“新聞紀事報”來的一封，從“每日先驅報”來的一封，信裏面謝謝我的投稿，但同時通知我不能發表我的文章。英國廣播電台方面也沒有希望，用“海員”來反駁“海員”一定連個機會影子都沒有。我決定試試另外的一個途徑，於是我就向檢察官寄去了下面的一封信：

“閣下，

“7月14日在朴茨茅斯發生了一個軍火爆炸的事件。在第一次發出的報告中說，‘並無陰謀破壞的問題’。幾天之後，發生了變化，又發出一個報告說，‘不能忽視陰謀破壞的問題’。

“隨後，首相在7月30日的廣播中發表一個肯定的聲明。他宣稱的確有人幹了一件陰謀破壞的事。

“現在，全國海員工會的一個名叫雅茨的人在海員的雜誌上——隨函附上一冊——作了一個確定的控訴。不僅如此，而且如果我对他的所述了解得沒有錯誤的話，他知道幹

這事的人是誰。

“因此我要以我國的一個公民的身分，懇切地請求您以檢察官的資格來追究這件事。警察廳應立即傳詢這個人，並且追究出他所知道的有關他所斷言的罪行的一切：

“(一)如果他知內情，就應當讓他對幹這事的人提起控訴，把他揭露出來，或者

“(二)他不知內情，而是故意地‘製造一種損害公眾的事’，那他自己就應該因這件事情被控訴。

“如能獲悉您決定對他這項關於陰謀破壞事件的非常嚴重的斷言採取行動，則將不勝欣慰，因為他所說的陰謀破壞含有危及許多生命的危險。

威廉·加拉赫謹啓”

我把這封信寄給雅茨一份，附了如下幾句：

“親愛的雅茨先生，

“茲奉上寄給檢察官的信一件。如果你是個愛護公眾的公民，你就應當自動地到警察廳去，把關於你所斷言的那個事件陰謀破壞行為的內情告訴他們。

威廉·加拉赫謹啓”

我把以上的兩封信各寄一份給陶遜，並附了一個短簡：

“親愛的文森特·陶遜爵士，

“我以一個最卑賤的公民身分，向您，爵士閣下，接洽，懇請你鼎力幫助雅茨先生，讓他把關於他和您似乎知悉的一件事情向警察廳作一個自動的陳述，那就是所謂朴茨茅斯陰謀破壞事件。

附上給檢察官和雅茨的信各一份。

威廉·加拉赫謹啓”

我接到陶遜的一張明信片，說收到了我的信，但沒有說別的，而雅茨連一封回信都沒有。我接到檢察長這樣的一封信：

“關於朴茨茅斯爆炸事件

先生，

“我已考慮了你 9 月 11 日關於此事的來信，現正請負責調查爆炸的人注意此事。

“然而，雅茨先生在所說的那篇文章裏面似乎並未暗示他有什麼特別的情報或証據，他不過重述並解釋各方面的人——包括首相在內——所作的公開言論而已，這些言論已在報紙上和別的地方一再發表過了。

西奧保爾·馬修士謹啓”

從這封信裏可以注意到兩件事情。一是那時對爆炸的調查還正在進行，然而 7 月 30 日首相就已作了一個十分肯定的聲明，說這是一個陰謀破壞的事件。二是雅茨這個人畢竟不是一隻海獅。他只是某一個流浪的海員遺落在工會總部裏面的一隻乾瘦的鸚鵡。

言歸正傳吧。1951 年 3 月 21 日，我又寫信給檢察官：

“親愛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曾給您寫了一封信，是關於與朴茨茅斯附近軍火爆炸相關連的陰謀破壞的斷言的。您回信說已經把我的控訴轉到調查委員會去了。

“我謹向您詢問，您是否已經接到委員會的報告，您是否根據調查所得的材料加以處理。

“我希望您能早予答覆，因為我本人正為這個斷言在請教律師。

威廉·加拉赫謹啓”

這是他的答覆：

“先生，

“昨日接到了你 3 月 21 日的來信。

“經商量考慮後，我現在對於這件事不擬採取更進一步的處理。

西奧保爾·馬修士謹啓”